

## 查證或不查，這是個問題： 報社記者查證日常新聞的多重考量\*

江靜之\*\*

---

投稿日期：2022 年 1 月 22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4 月 30 日。

\*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4-125-MY2）之部分研究成果。作者感謝所有接受本研究訪談之新聞工作者，以及匿名評審之意見與建議。

\*\* 江靜之為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教授，e-mail: morecc@nccu.edu.tw。

本文引用格式：

江靜之（2022）。〈查證或不查，這是個問題：報社記者查證日常新聞的多重考量〉，《新聞學研究》，152: 1-47。DOI: 10.30386/MCR.202207.0011

## 《摘要》

有鑑於過去研究偏向忽略日常新聞查證的複雜與動態情境，本研究透過 25 位在報社服務之政治、司法及財經記者的深度訪談資料，探究記者製作日常文字新聞時，決定查證與否的情境考量。首先，本研究指出記者是在查證成本、新聞效益與查證不足的風險中權衡輕重。當新聞效益越強，查證不足的風險越大，記者採取查證行動的可能性越高；查證成本越低，甚至低到無須考慮，「查證」便成為記者蒐集資料過程中的一環。其次，本研究強調查證行動的未來導向，記者不但藉此發展新聞，更能累積其情境與領域知識，以及對權威消息來源可信度的感知，降低未來的查證成本，並提升日後的查證效率。最後，本研究分析記者考慮是否查證日常新聞的四個主要情境要素：「日常新聞文類的限制與資源」、「訊息內容的主、客觀偏向」、「消息來源的權威性高低」及「訊息是否符合記者已知」，指出這些看起來個別獨立的因素，其實是記者在前述情境下，多方考量的結果。

關鍵詞：日常新聞查證、未來導向、查證成本、消息來源可信度、情境、新聞文類

## 壹、前言

新聞專業的重要指標之一，是證實資訊真實性，並賦予資料與證據一套秩序及意義（Coddington, 2014）。即使到了 Web 2.0 時代，Canter（2014）研究指出，英國地方報記者依然認為查證是記者職業之核心。「查證」賦予新聞可信度（credibility）及信任感（Hermida, 2012, p. 661），而包含查證在內的新聞技能（journalism skills）更是新聞研究的基礎（Joseph, 2019）。

雖然在日常新聞實務上，Ettema & Glasser（2006）認為記者因為幾乎沒有時間查證，所以偏向追求「正確」，而非「真實」（veracity）。但 Godler & Reich（2017）研究以色列記者發現，許多時候記者都認真地找尋證據；隨後 Barnoy & Reich（2019）研究也指出，以色列紙本與網路記者報導日常新聞時並未輕忽報導的真實性。在其研究中，32%的日常新聞有進行單一消息來源的查證，17%有多重查證，就像進行調查報導一般。而且他們的研究也發現，在 2016 至 2017 年之間，記者查證的頻率與 2006、2011 年差不多，並未有顯著差異。

事實上，Tuchman（1978）早已指出，記者身處在機構化的新聞網絡中，主要靠複雜的組織與跨組織關係累積經驗，包含假設某些消息來源的組織位置讓他／她能比其他人處理更多事實（facts），提供較正確的資訊。Ettema & Glasser（2006）認為，對記者來說，位居官僚體系的人因其位置與權威性，使之成為不證自明、有能力獲知的知者（self-evidently competent knowers），而日常新聞報導也多聚焦於官僚體系的文件及程序，因官僚體系產製、組織與提供的資訊便是事實。

是故，記者無須花費太多時間查證日常新聞。Machill & Beiler

(2009) 研究發現，德國記者平均每天只花約 11 分鐘確認消息來源與資訊的可信度或正確性。推測其因，Machill & Beiler 指出，可能是記者缺乏財務與時間資源的支持，以及記者認識大部分消息來源，相信其提供的資訊，所以認為無須再行確認。此外，Barnoy & Reich (2020, p. 19) 也直言，雖然我們期待記者會查證所有訊息，但新聞實務上並非如此，其中一個原因便是記者是在眾多情境限制下工作，提供「相對正確的」(relatively accurate) 資訊即可。如同 Kovach & Rosenstiel (2001, p. 42) 所言，新聞追求的是一種實務或功能形式的真相 (a practical or functional form of truth)。江靜之 (2016 年 6 月) 稱之為「暫時可用的無誤真相」。

雖然就理論上來說，記者需要分別查證「消息來源」與「訊息內容」，以相互對照，確認來源與內容是否指向相同故事 (Brandtzaeg, Lüders, Spangenberg, Rath-Wiggins, & Følstad, 2016, p. 325)，但在日常新聞實務上，消息來源查證才是核心 (Barnoy & Reich, 2020; Rauchfleisch, Artho, Metag, Post, & Schäfer, 2017)。陳百齡與王凌霄 (2011, 頁 14) 也發現，面對截稿的時間壓力，記者常將新聞查證窄化為「來源查證」，偏向認為只要有可信的消息來源就已完成查證。

或許也因如此，「消息來源可信度」一直是探討記者日常新聞查證的焦點之一 (如 Barnoy & Reich, 2020; Heflin, 2010; Heravi & Harrower, 2016; Hermida, 2015; Lecheler & Kruike-meier, 2015; Machill & Beiler, 2009; Reich, 2011a, 2011b; Shapiro, Brin, Bédard-Brûlé, & Mychajlowycz, 2013; Tylor, 2015; Wintterlin, 2017; Wintterlin & Blöbaum, 2016)。然而，「消息來源可信度」無法完全解釋記者為何進行交叉確認 (cross-checking, Reich, 2011b)，因為記者是否進行查證乃視情境而定 (Tuchman, 1978, p. 99)。Reich (2011b) 也指出，其他因素如新聞爭議性高低、資訊性質、資訊可信度、對記者或新聞組織聲譽可能帶來的潛在風險等，皆可

能影響記者查證，可惜 Reich 並未進一步有系統地研究。

目前雖有少數研究探析影響記者確認或查證之情境要素，但這些情境卻常被化約成個別獨立的因素（如 Diekerhof & Bakker, 2012; Shapiro et al., 2013），未能深入研究記者如何綜合考量多重情境因素，決定是否查證日常新聞，更忽略這些情境要素的動態關係，以及查證行動的「未來導向」。因此，本研究聚焦於報紙日常新聞，深度訪談臺灣四大報政治、司法、財經記者，<sup>1</sup> 深入分析記者在製作日常新聞報導過程中，決定「查證或不查」之多重情境考量，一來深化我們對日常新聞查證行動之情境知識，二來彌補過去研究忽略記者查證動態的不足之處。

## 貳、文獻檢閱

要探析記者如何在複雜、交織的情境下，決定是否採取查證行動之前，我們要先借取 Blandford & Attfield（2010）提出的資訊旅程模式（The Information Journey Model），從資訊工作者的個人角度一探「查證」歷程。

Blandford & Attfield（2010, pp. 32-33）主張，包含記者在內的資訊工作可分四個階段。他們以報導火車意外為例指出，記者會(1)「確認資訊需求」，例如需要支持「這是有史以來造成傷亡最多的火車意外」此一報導角度的相關資訊。接著，記者在新聞價值、資訊正確度、故事角度及呈現等限制下，(2)「獲取」支持報導角度的相關資訊，並且(3)「詮釋及確認訊息有效性」，包含將來自多個來源的訊息進行交叉驗證。但由於故事角度會引導記者的資料詮釋，所以記者常須與不斷更新

---

<sup>1</sup> 雖然《蘋果日報》紙本於 2021 年 5 月 18 日停止發行，但因本文執行研究期間為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7 月，本文還是以「四大報」稱之。

的資訊互動，再(4)「使用詮釋」(using the interpretation)，製成報導。

從上可知，「查證」發生在第三階段，且同時涉及心理的詮釋活動及外在的確認行動，尤其後者與資料蒐集活動交織，難以清楚區辨 (Shapiro et al., 2013)。Blandford & Attfield (2010) 也提醒，上述四個階段並非連續關係，例如記者可能因意外「獲取資訊」啟動資訊旅程，而非起於「資訊需求」；抑或預測自己在報導「使用詮釋」上的需求（例如需要具名的消息來源），再依此導引資訊活動（例如找願意具名的消息來源）。

而且，在 Shapiro et al. (2013) 的研究中，多位記者自承，查證行動須視報導情境而定。舉例來說，並非所有新聞類型都需要相同質量的證據，如日常新聞與調查報導對證據的要求就大不相同 (Ettema & Glasser, 2006)。本研究以下透過文獻檢閱，歸納日常新聞之查證需求。

## 一、日常新聞的查證需求

雖然新聞查證也是新聞組織之事，但除了影響性極大的重要新聞，一般日常新聞查證與否的決定多在記者個人。例如，江靜之 (2022) 研究發現，臺灣四大報偏向將一般日常新聞查證的責任置於記者個人，相信記者會妥善處理日常新聞的查證問題。那麼，對記者來說，日常新聞的查證需求為何？

事實上，即使製作深度報導，Diekerhof & Bakker (2012) 訪談荷蘭記者發現，記者花在查證上的時間也不多，除非消息來源在該新聞議題上有特定利益關係，或確認消息來源提供的事實資訊又快又容易，否則

記者不常進行確認。而且，他們發現記者常因下列理由省略查證步驟：(1) 做到平衡報導便無須額外查證，尤其大部分受訪記者主張，意見本身便是真實的，記者的責任是找不同意見，讓新聞故事可以呈現兩造說法；(2) 使用引述，尤其是直接引述，讓消息來源為自己所言負責，記者便可避免查證責任；(3) 無須查證個人意見或經驗等，被視為個人產物的資訊；(4) 官方或權威消息來源的陳述通常無須查證，因為他們有據實以告的壓力；(5) 資深記者熟悉自己經營的路線領域，認識消息來源多年，相信消息來源可信度，故可省略查證；(6) 對自己同事及同業已經使用的消息來源，記者偏向認為無須查證，因為他們假設這些消息來源的可信度已被確認。

本研究認為，上述理由透露記者評估日常新聞查證需求的情境考量，可歸納成三部分：第一，與新聞呈現有關。如前所述，記者會預測新聞報導「詮釋使用」所需，重新界定資訊需求，以降低尋找、取得與詮釋資訊的需求，最小化要付出的心力（Blandford & Attfield, 2010, p. 38）。因此，記者會以新聞已做到平衡報導（第 1 點）、引述消息來源（第 2 點），降低查證需要。如同 Diekerhof & Bakker（2012）直指，平衡、客觀等原則在實務上常被化約為「呈現正反雙方的意見」，記者甚至可能以「意見本身就是真實的」為由，僅取一方意見，不做查證。

尤其查證需要耗費時間與心力，所以記者通常不會為那些不重要、相對微小的資訊，發動查證行動（Thurman & Walters, 2013）。舉例來說，Shapiro et al.（2013）研究發現，記者認為必須查證名字、地理資訊（如地點名稱、距離等）及可能涉及毀謗的事實資訊，但若不是新聞故事的必要成分（如透過員工數估算公司規模），記者則傾向認為不用查證。尤其在純淨新聞中，倒金字塔的寫作模式要求記者將訊息內容按照重要性依次排列，故記者會將最重要的成分放在導言（Brooks, Kennedy,

Moen, & Ranly, 1992 / 李利國、黃淑敏譯, 1995, 頁 43-44), 而導言通常又包含「5W1H」的事實資訊(同上引, 頁 47), 也成為記者須查證的必要成分。

此外, 記者可運用各種論述資源, 降低查證不足可能帶來的風險。江靜之(2016 年 6 月)的研究發現, 只要支持新聞重點的證據無誤, 人事時地物等表面事實正確, 報社記者便可用「模糊」、「兩面並陳」等論述策略解決證據不足的查證難題。蕭伊貽、陳百齡(2013 年 7 月)也指出, 為彌補查證不足, 電視記者會使用第三方影音內容, 再以看圖說故事的方式描述之, 或拍攝網友留言、路人對畫面的看法等, 轉移新聞重點。

第二, 與訊息內容性質相關, 亦即並非所有訊息皆可以或需要查證(第 3 點)。除了涉及個人價值判斷、意見、推論、經驗感受等缺乏客觀判準之事(Donsbach, 2004; Shapiro et al., 2013), 科學家的宣稱(Donsbach, 2004)、消息來源個人史及無法確認的細節(例如場景描述, Shapiro et al., 2013)等, 也多被記者視為無須查證的訊息。此外, 黃郁琄(2000, 頁 77)研究發現, 那些不是在採訪新聞過程中建構出來的「非藝術證據」, 如文件、備忘錄等, 也常被記者當成不證自明的事實保證。

第三, 與消息來源有關, 包含消息來源權威性(第 4 點)與可信度(第 5 點)。此外, Winterlin(2017)研究記者對透過社群媒體聯絡的遠端消息來源之信任(trust)也發現, 除了記者自己與消息來源的互動外, 其他媒體的引用也會增加消息來源可信度(第 6 點), 進而, 「新聞」常被記者視為可信的消息來源(Ericson, 1998, p. 87)。而且透過彼此引述, 「新聞」又成為 Tuchman(1978, p. 95)所說的, 相互自我證實的事實網絡。雖然不同新聞媒體的報導在新聞工作者心中有著不同份

量，例如臺灣網路新聞編輯認為中央社報導最可信（李嘉紘，2013，頁82）。

值得說明的是，如本文前言所述，消息來源查證是記者查證日常新聞的關鍵。一方面，對日常新聞來說，Kovach & Rosenstiel（2010, p. 98）指出，消息來源的品質、專家性、優勢觀點及知識直接性等皆是一種證據形態，新聞證據常與「消息來源」緊密相連。甚至如 Tuchman（1978, p. 99）所言，若消息來源的行動符合社會期待，記者通常不再追究其宣稱是否為真。另一方面，對記者來說，運用「消息來源可信度」這個實務機制（practical mechanism, Reich, 2011a），可讓自己在有限的時間和資源，以及高度不確定性等眾多限制下，加快工作節奏，並減緩日漸增加的壓力（Barnoy & Reich, 2020, p. 19）。以下本文繼續討論日常新聞查證與消息來源可信度的關係。

## 二、日常新聞查證與消息來源可信度

Sigal（1987, pp. 15-16, as cited in Goldstein, 2007, p. 57）曾說，新聞就是報導某人說的，即將或已經發生的事情。尤其報導日常新聞，記者大多依賴機構建制的權威消息來源。從社會的可信度階層（a hierarchy of credibility）來看，Becker（1967）指出，人們認為在具有層級結構的團體中，位於高層者因能近用各種資訊，對正在發生之事有較完整的認識，故擁有界定真實的權力。相對的，位於下層者擁有的資訊則被認為不完整，及其觀點也是部分且扭曲的。因此，人們傾向認為團體中高層人士敘述該團體之事最為可信。這也可以解釋為何記者查證首重消息來源身分（含職務、層級等），以及他們接近資訊的程度，而非消息來源人數的多寡（黃郁琄，2000；Goldstein, 2007, p. 16）。

而消息來源可信度也成為記者決定是否接受，進而查證資訊內容的實踐機制 (Reich, 2011a)，「評估消息來源可信度」成為記者的重點工作之一 (Winterlin & Blöbaum, 2016)。舉例來說，黃郁琄 (2000, 頁 89) 研究記者查證的心理歷程發現，記者主要根據消息來源判斷事實，唯有當其懷疑消息來源可信度時，才會根據資訊內容判斷。Barnoy & Reich (2020) 的研究也指出，雖然記者在理論上可以分別評估消息來源與內容的可信度，但在實務上，記者卻不這麼做。他們發現記者大多依賴消息來源可信度，即使遇到衝突的訊息內容，記者也傾向根據消息來源特徵進行評估，而非內容本身。

但記者如何判斷消息來源的「可信度」？Barnoy & Reich (2020, p. 3) 指出，「可信度」為信賴者對被信賴者「值得信賴」(trustworthiness) 程度的感知。Barnoy & Reich 的研究發現，預測消息來源及內容可信度最重要及顯著的指標是「消息來源角色」。一般而言，官方消息來源 (official sources) 在特定議題上，由於擁有組織地位 (organizational position) 及代表政府或組織，有能力提供高品質與正確的資訊，會被認為較為可信 (同上引, p. 14)。不過，當消息來源是利害關係人時，記者偏向查證 (Diekerhof & Bakker, 2012)，因為記者較相信與新聞事件沒有利益衝突的消息來源 (黃郁琄, 2000; Elliott, 1994, as cited in Goldstein, 2007, p. 15)，同時偏信人們提出違反自己利益的陳述 (Goldstein, 2007)。

此外，黃郁琄 (2000, 頁 63) 的研究發現，記者會根據消息來源過去信用的「歷史的保證」，判斷事實。而 Barnoy & Reich (2020) 的研究則發現，記者認為經常往來的 (regular) 消息來源比不常往來的消息來源更為可信。

進而，針對消息來源所言，根據 Godler & Reich (2017)，記者會

透過消息來源言談「證據的證據」，判斷其言內容的可信度，包含消息來源提供訊息須付出何種成本或獲得什麼社會獎賞的「社會證據」（social evidence）、消息來源過去是否做過相似宣稱或獲得其他權威人士認可的「程序證據」（procedural evidence），以及從消息來源的言談行為推斷其是否真誠（sincerity）的「心理證據」（psychological evidence）。這三類證據也都出現在黃郁琄（2000）的研究發現中，例如「社會證據」類似「目的的保證」、「程序證據」類似「歷史的保證」，而「心理證據」則類似黃郁琄在「與資訊有關的保證」中所發現的，與消息來源所言有關的「細節的保證」（例如訊息是否具體明確或有足夠細節）及「語氣的保證」（例如敘述順暢、沒有猶豫的言談，較為可信）。

從上述研究也可理解，為何記者查證偏向選擇自己熟識的消息來源，因為其較能有效地了解消息來源動機（知其提供訊息可能要付出的成本或獲得之獎賞）、查知其過去是否做過類似宣稱，以及從消息來源的言談表現判斷其所言之真實性。尤其在截稿時間壓力下，記者通常不願浪費寶貴的查證時間在可疑、不可信的消息來源身上（Martin, 2017）。在 Barnoy & Reich（2020, p. 16）的研究中，有些記者表示不可信的消息來源可能誤導自己，使得自己即使花費許多心力，最終也無法確認事實，甚至少部分記者表示不願理會低可信度的消息來源，因為他們只會為記者平添煩惱。Fenton & Witschge（2011, p. 154）的研究也指出，記者認為在每天費時篩選的大量電子郵件中，大部分都不具權威性，也不足採信，因此記者很少回應讀者來信，也不常從部落格找新聞。

故此，根據 Hermida（2012），Oriella PR Network 在 2011 年調查 15 個國家的 500 位記者發現，記者查證主要還是依賴傳統消息來源。

Lecheler & Kruikemeier (2015) 檢閱相關實證研究也發現，記者的主要消息來源還是傳統菁英人士，除非沒有更好的選擇，否則社群媒體較少被當成消息來源。Zhang & Li (2020) 透過線上問卷調查香港媒體記者，同樣發現相較於社群媒體，記者查證更偏向使用傳統方法，如交叉訪問或使用權威消息來源發布的資料等。以推特為例，Heravi & Harrower (2016, p. 1201) 問卷調查發現，愛爾蘭記者最常用之找新聞線索與內容，卻較少用之查證消息，除了可能因為查證社群媒體消息會花更多時間外，也因記者認為社群媒體上的消息較不可信。他們指出，記者查證主要還是使用社群媒體世界以外的消息來源，而且記者最常用來證實訊息的方法便是直接跟自己信賴的人聯絡。甚至在其研究中，超過八成的受訪記者是聯絡官方來證實社群媒體消息。

此外，Lecheler & Kruikemeier (2015) 指出，社群媒體訊息多被用在增加新聞趣味，且記者會避免在重要新聞中使用社群媒體來源。劉慧雯 (2013, 頁 15) 分析臺灣電視新聞同樣發現，「網友」作為一種消息來源，大多被用於報導奇聞軼事的軟性新聞。難怪 Thurman (2015) 直指，科技至今似乎只改變了記者與消息來源的溝通方式，尚未對「誰是消息來源」造成太大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消息來源角色及其可信度僅能部分解釋記者的查證決定。因為根據 Reich (2011a) 的研究，雖然記者依賴那些被認為可信度高的消息來源，而且消息來源可信度越低，記者進行越多交叉確認。不過，Reich 的研究也發現，並非所有可信度不高的消息來源都經過交叉確認，而且有些新聞即使消息來源有高可信度，記者依然會交叉確認。這顯示除了消息來源可信度外，尚有其他情境因素，如本研究前述之新聞呈現需求及訊息內容性質等，會影響記者的日常新聞查證決定。

綜上所述，記者決定日常新聞查證與否，實涉及查證成本與效益

（例如記者通常不會查證其認為不重要的微小資訊），以及查證不足可能帶來風險（例如記者認為必須查證可能涉及毀謗的資訊）的權衡考量。可惜的是，過去文獻並未將之合併討論，也忽略查證行動的未來導向，更未深入探討其如何交織於記者考量查證與否的情境要素之間。根據過去文獻，本研究指出記者決定查證日常新聞與否的主要考量情境有三：(1) 日常新聞文類的限制與資源，包含導言通常包含 5W1H 的事實資訊、引述及平衡報導等；(2) 訊息內容是否可供查證，例如個人經驗、意見或無法確認的細節等常被認為無法查證；(3) 消息來源是否可信，需要查證，其中最重要的指標為消息來源角色，例如消息來源是否具有權威性。本研究將進一步指出，前述情境要素並非單獨存在，而是在記者的多方考量下相互交織，從而影響記者決定日常新聞的查證與否。

## 參、研究方法

為研究記者查證日常新聞之實務考量、過程，以及新聞組織的查證規範與流程等，本研究自 2018 年 4 月中旬至 2019 年 7 月初止，深度訪談當時任職或曾任職於臺灣四大報的記者及編務主管共 30 位。而由於本研究旨從記者角度出發，探析記者決定日常新聞查證與否的實務考量，故將分析焦點置於 25 位主要從記者角度出發，分享其產製文字新聞的查證經驗與決策過程之受訪者。

本研究深訪四大報政治、司法及財經記者，一方面因報紙新聞比其他媒體有較多查證時間，且一般認為報社記者在路線經營上，能投注較多時間與心力。另一方面因政治、司法及財經日常新聞影響範圍較大，對查證的要求較高。本研究分析對象如表 1 所示，包含《自由時報》記者

5 位、《蘋果日報》6 位，以及《中國時報》及《聯合報》各 7 位，其中，各報政治、司法及財經記者至少各 1 位。受訪記者產製之文字新聞可同時提供紙本與網路新聞（包含即時新聞）使用，而這也成為記者考慮查證與否的重要情境之一。

表 1：本研究受訪者資料

受訪者 編號	服務報社/ 路線	截至受訪時之 新聞資歷	受訪者 編號	服務報社/ 路線	截至受訪時之 新聞資歷
A1	蘋果/政治	5 年（含）以下	L1	自由/政治	10 年（含）以上
A2	蘋果/政治	10 年（含）以上	L2	自由/財經	5 至 10 年
A3	蘋果/財經	10 年（含）以上	L3	自由/財經	10 年（含）以上
A4	蘋果/財經	5 年（含）以下	L4	自由/司法	5 至 10 年
A5	蘋果/司法	10 年（含）以上	L5	自由/司法	5 至 10 年
A6	蘋果/司法	10 年（含）以上	U1	聯合/政治	5 年（含）以下
C1	中時/政治	5 年（含）以下	U2	聯合/政治	5 至 10 年
C2	中時/政治	10 年（含）以上	U3	聯合/財經	5 年（含）以下
C3	中時/財經	10 年（含）以上	U4	聯合/財經	10 年（含）以上
C4	中時/經濟	10 年（含）以上	U5	聯合/財經	10 年（含）以上
C5	工商/科技 <sup>2</sup>	10 年（含）以上	U6	聯合/司法	5 年（含）以下
C6	中時/司法	10 年（含）以上	U7	聯合/司法	5 至 10 年
C7	中時/司法	10 年（含）以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此外，為將受訪記者作匿名處理，本研究使用受訪者服務之報社英文名的開頭字母（《蘋果日報》為 A、《中國時報》為 C、《自由時報》為 L、《聯合報》為 U），以及受訪者在該報受訪記者中的受訪順

<sup>2</sup> 根據本研究訪談，於本研究執行期間，《中國時報》財經新聞供稿來源包含《工商時報》，故本研究包含 1 位曾服務於《中國時報》，受訪當時服務於《工商時報》科技新聞中心之財經記者。

序合併，作為受訪者代號。25位受訪者的新聞相關工作年資，至接受本研究訪談時間為止，5年（含）以下有6位、5至10年有5位，以及10年（含）以上有14位。

每位受訪者接受研究者約兩小時的一對一面訪。對於記者決定查證與否的相關考量，研究者先請受訪者針對自己決定要使用在新聞稿中的資訊，將之分成「一定要查證」、「可查證也可不查」及「不用查證」三種類型，例如：「你覺得什麼是你一定要查證，不查證你絕不會使用的？」之後研究者請受訪者逐一舉實例說明，並追問細節，或再以類似案例，請受訪者說明如何決定查證與否。

訪談過程全程錄音，之後轉製成逐字稿。分析時，研究者先歸納受訪者指出的資訊類型，再深入分析受訪者闡述的實例情境與決策過程，並從中整理相似與相異點。在研究呈現上，本研究於必要時將直接引述受訪者話語，於括弧中補充受訪者的談話脈絡，並在不傷害文意下，刪除贅字、語助詞等，以利讀者閱讀。

## 肆、研究發現

如本研究文獻所述，記者的查證決定涉及眾多情境因素考量，不宜個別單一論之。而且，本研究發現，這些情境因素相互交織、彼此影響，且記者的查證行動也可能改變情境條件。因此，本研究根據深度訪談，先指出記者決定查證與否所涉及的基本考量，包含查證須付出的成本、獲得的新聞效益，以及查證不足可能帶來之風險。之後，本研究強調記者的查證行動如何具有未來導向，再逐一深入分析以往被視為相對固定，影響記者決定查證與否的情境要素：「日常新聞文類（新聞呈現）」、「訊息內容的主／客觀偏向」及「消息來源權威性」，同時提

出另一關鍵要素：「訊息與記者已知的相符程度」，了解記者查證日常新聞的多元考量。

## 一、日常新聞查證情境與行動之動態關係

所有受訪記者皆知查證重要，但在日常新聞實務上，記者無須也絕非事事查證。究其原因，如前所述，乃因新聞可以接受相對正確，「暫時可用的無誤真相」（江靜之，2016 年 6 月），讓記者可在查證「成本」、新聞「效益」及查證不足的「風險」之間權衡輕重，再決定是否採取查證行動。對此，雖然過去研究也曾提及查證成本會影響記者查證（如 Dickerhof & Bakker, 2012; Heravi & Harrower, 2016），卻未曾深入探討查證成本的具體內涵、與其他情境要素的關係，更忽略記者此刻查證行動與其「未來」查證成本、效益或風險之間的關係。本研究以下發現將可補此不足。

### （一）成本、效益與風險之權衡拿捏

#### 1. 查證成本

記者查證須花費金錢、時間與心力。雖然查證花費的通訊成本隨科技發展降低，但對工作節奏變快且即時多工的記者（王淑美，2018）來說，時間成本卻越顯珍貴。以報社記者來說，查訪（包含確認目標消息來源及其聯絡方式等）、實際聯絡（包含聯絡目標消息來源或等其回覆）、訪談消息來源，消化及整理訊息等皆須時間。U3 以查證法案模糊處為例指出：

先找到主管機關。主管機關裡面又分各種不同職位，然後

找到寫（法案）的那個人……等待的時間、採訪的時間跟理解……整理一下再問他第二次……通常大概是兩個小時。

此外，向消息來源查證敏感議題，除非查證已近完備，否則記者可能承受心理壓力，U2 稱之為「情緒障礙」，例如擔心遭受訪者「痛罵」；抑或為避免洩漏自己正在查證的消息內容或來源，記者查證可能如 A6 說的「迂迴」、「磨」，耗費時間與心力，到後來也可能「事倍功半，花很多力氣不一定會有收穫」。特別面對陌生或不熟悉的消息來源時，記者因未曾或與之少有互動，缺乏有效判斷消息來源可信度的能力與信心，使其須耗費更多時間及心力，判斷消息來源提供訊息之真偽。

正因查證需要成本，故除非查證如 Diekerhof & Bakker (2012) 所說，快又便捷，成本低至無須考量，否則記者通常會視新聞效益及查證不足的風險高低，決定投入多少時間及心力在查證上。如同王淑美 (2018, 頁 85) 研究指出，記者「依新聞重要性調配工作先後順序，以及所投注的時間精力」，查證也是如此：「（新聞）爭議不大的時候，我可能忙其他事情，就不求證了」（C3）。

值得一提的是，記者除了向知情人士查證，也能請其他消息來源協助查證，降低自己的查證成本。例如荷蘭記者會請公關人員、專家等消息來源，幫忙確認事實 (Diekerhof & Bakker, 2012)。本研究受訪者 U1 也提及曾請消息來源幫忙確認某機關公文系統是否有某件公文，或 U6 會請其他消息來源提供「更明確的資料」。

## 2. 新聞效益

對記者來說，若訊息模糊或不足採信，且新聞價值低，便無須耗費查證成本。例如來自社群媒體的訊息，U6 指出，由於此類資訊經常無

法分辨真偽，需要更多查證，所以除非重要新聞，否則他通常不予處理。C3 也直言，是否採取查證行動：「還是回歸到這個新聞有沒有大到那個地步」。他以查證某外國廠商官網宣布之新產品訊息為例，由於新產品功能未影響「普羅大眾太多權益」，加上向國內供應商查證可能涉及商業機密而「非常耗時」，故他認為此類訊息「可查（證）可不查（證）」。L2 以下所言更是清楚：

如果這是很重要又很有影響力的新聞，你一定會再去求證。……如果覺得這個影響力很輕微，再來就是有沒有上（新聞版面）都無所謂的新聞，就不用再查證，也不要再追了。

值得注意的是，重大、有影響力且查證不易的新聞放入競爭情境中，便可能成為「獨家」、「頭版」等高效益新聞。Shoemaker & Reese (1996, p. 125) 指出，即使只領先競爭對手幾秒鐘，「獨家新聞」也能讓組織藉此宣稱表現傑出，同時成為評估記者表現優劣之標準。而且，根據本研究訪談，獨家新聞讓記者及新聞組織在同業及消息來源中樹立權威。例如 U2 表示，獨家新聞除了是他的「成就感來源」，也是建立威信的方式，讓他能獲得同業認可並增加互動，也降低權威消息來源欺瞞他的可能性，因為獨家新聞等於宣告：「我（指記者自己）跑得到，所以你（指消息來源）不要騙我。我不是只有你一個消息來源，（我）還有其他消息來源」。

相較之下，重要性或影響力較低的新聞，由於其新聞效益較低，受訪記者也會盡量避免付出查證成本。這清楚顯示在一般被視為軟性新聞的人物故事上。例如 L5 表示：

這種新聞它可能就是一天的新聞，或者可能就是一個小時

的新聞。基本上我們會善意的相信他（指消息來源），不會去欺騙或想要利用別人……像這種軟性的新聞就不會特別去查證。

除了預設此類新聞的消息來源不會刻意提供錯誤訊息，受訪記者也多認為，此類新聞即使有誤，也無傷大雅。加上涉及個人歷史、經驗或意見的訊息無法或查證困難，若真有疑慮，記者會選擇捨棄該訊息，如同 A4 表示：「我不會為人物專訪去採訪另外一個人，因為這就工程太浩大了」。

換言之，對於新聞價值或影響性低的新聞，記者會盡量避免耗費查證成本，以將時間與心力投注在影響力大的高效益新聞。不過，有時考量新聞競爭，記者也無法等待證據完備再行報導（江靜之，2016 年 6 月），需要衡量新聞效益的大小與查證不足的風險。

### 3. 查證不足的風險

Winterlin（2017）認為，記者對新聞來源的信任主要透過消息來源可信度與風險認知判斷而得，而後者便涉及記者使用消息來源可能導致正、負面結果可能性的認知。

本研究所有受訪者皆提及因查證不足可能引發的法律訴訟，或被指控為不實報導，影響記者與報社信譽。首先，如同 A2 表示，一定要查證的訊息便是那些查證不實「一定會被告」的新聞。尤其涉及他人、國家社會利益的負面新聞，以財經新聞為例，C5 指出：

對財經記者來說風險最高的事情是，（報導）會影響公司營運跟股價的事情……公司認為（報導）對公司不利，會影響它的股價，它可以告你，所以這一定要很小心，跟一定要求證

到的事情。

因此，所有受訪記者皆強調「向當事者或其發言人查證」的重要。特別某些容易興訟的新聞當事人，A2 強調「一定要有實（證）」；A5 也表示：「如果寫錯他一定會告，所以更要小心」。即使不會興訟，C4 指出有些當事人「不好惹」，因其會公開否認報導內容，同樣可能有損記者或報社的公信力。抑或為了自己與消息來源的長期關係著想，C4 繼續表示，即便已經確認無誤，還是會與當事人連絡：

通知他一下，不要讓他嚇到。至少不要讓他隔天見報的時候，跟你 **complain**……就是不要讓別人有藉口說，你都沒有（跟當事人）查證。至於他講什麼內容，說真的也不是那麼重要了。

相較之下，對於那些無損他人利益，且消息來源也樂於受訪的正面新聞，受訪記者多認為沒有查證的必要，因為報導此類新聞鮮少有查證不足的風險。U4 以報導企業舉辦員工活動為例，指出此類新聞「沒有什麼利害關係，也沒有什麼爭議性，不需要查證」。L3 也直言：「正面（新聞）我們都沒有做查證，誰（報導）正面（新聞）會做查證？」。

其次，影響社會大眾的國安、外交或經濟等議題，由於未經查證的訊息可能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也被受訪記者歸為「必須查證」的範圍。也因如此，向官方權威消息來源查證，常如 U2 所說，是個「自我保護」的機制。而且，受訪政治記者常強調，要避免被權威消息來源利用，「放話」（C1、L1）或「放消息」（A2），對於可能損害他人利益或影響政壇風氣、選情等訊息，皆須查證。此外，在社會文化層面，

由於「死亡」常被人們視為某種禁忌（曾美珠、李燕蕙，2006，頁408），A3 及 C3 也強調，「死訊」必須確實查證。

換言之，「查證」除可提高新聞正確度及真實性，對記者來說，也是一個避險行動。如同之前文獻所述，有時「查證」作為一種策略儀式，可降低記者被批評或訴訟風險，行動意義大於查證所得。尤其向負面新聞當事人查證，即使預想其回應千篇一律，或拒絕回應，甚至否認，記者依然會採取查證行動。這除了顯示記者已盡查證之責，更可滿足日常新聞對「平衡報導」的呈現要求，如同以下受訪者所言：

如果真的很趕時間，你起碼要問到被指控那個人的回應，你要做到平衡。（A2）

（指某個案）你一定要做查證，那個是你要正反並陳……即便你知道某某（指該個案當事人）可能會跟你說絕無此事之類的，那也是一個查證過程。（C3）

## （二）查證行動的未來導向

許多時候，查證並非隨個別報導完成便結束的單一行動。本研究發現，有些新聞即使已經刊出，受訪記者還是持續查證。歸納深度訪談結果，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尋找後續報導的機會，甚至可能如 Blandford & Attfield（2010）所說，藉「意外獲取資訊」，啟動另一段資訊旅程。舉例來說，當 A1 被問及為何在某篇報導刊出後，還向某權威消息來源查證事件細節，他表示找這位權威消息來源「已經算是一個例行公事」，除了「想要聊聊天」，也想再次確認「（之前報導）我們的資訊有沒有錯……是不是我寫的那樣子」，以及「再去擴大這個事情（指之前報導

的新聞事件)」。

如此我們也可理解，為何記者即使已親眼目睹新聞事件或掌握客觀證據，理論上無須再確認事件本身之真偽（之後將詳細分析此點），但在時間允許下，他／她依然想再次確認。如同司法記者 U7 表示，即便自己親眼目睹檢調人員帶走某人或搜索某處，她還是「習慣會再去多問兩句」，確認自己所見，同時追問其他相關訊息。或是 U5 表示，即便拿到白紙黑字的文件，如會議紀錄，若發現有熟識之人參與會議，還是會再詢問之。尤其衝突的資料很容易成為另一個新聞點，如以下 2 位受訪記者所述：

實質上的公文內容，跟他（指消息來源）講的差距越大的時候，對我們來講當然是越精彩。（因為）就有個對比，就是說我們在寫稿的時候，可能就寫說實際上（公文內容）怎麼樣，但他（指消息來源）只說怎麼樣。（U1）

（問：如果你已經有當事人說法或證據，還需要官方說法嗎？）我想聽他怎麼掰。他怎麼用我已經知道的事情，再去掰一個似是而非的理由給我（問：然後呢？）然後我就會寫下來。他可以凸顯出我報這個事情就是對的，所以他才要迴避。

（A1）

第二，確認、查證新聞事件，豐富已知，同時累積對權威消息來源可信度的感知準確度，提升之後的查證效率（之後將詳細分析此點）。舉例來說，被問及如何確信某個消息來源提供的訊息正確無誤，財經記者 L2 回答：

透過你之前的採訪經驗，你之前問他的事情，他每次跟你

講的幾乎都沒有出錯過……他的身分，第二個是過去給我的經驗，給我的紀錄是非常好。

以上類似 L12 的回答出現在許多受訪記者訪談中。本研究認為，記者對權威消息來源的權威性（例如是否為黨內核心人士）與可信度（例如是否據實以告）感知並非固著於機構組織或消息來源個人特質之上，而是在每個查證行動與結果驗證中成形。不同於與一般個別民眾僅有少數且短暫的接觸，記者與線上權威消息來源是長期的互動關係，故每個查證行動都給記者一個測試消息來源權威性與可信度的機會。而報導刊出後的結果，無論內容是正確或錯誤，都讓記者有機會驗證其對刊出內容及消息來源的「假設」——假設報導內容正確、假設消息來源夠權威又可信。如政治記者 A2 舉例說：「有的人開記者會，常常到最後發覺他（指開記者會之人）查證出包，後來大家（指記者）就覺得這個人開完（記者會），就是不可信的，就不會用」。

也因此，記者站在消息來源角度，考慮消息來源的受訪成本，以及報導可能對消息來源造成的負面影響，也與記者之後可能要付出的查證成本與承受之可能風險有關。前者如 A1 表示自己查證會盡量降低打擾消息來源的頻率與時間，以提高獲得的資訊品質及該消息來源未來的受訪意願：

受訪是需要成本的，我不可能讓我的受訪者花很多成本接受我兩次訪問……整件事情結束後我去問他，我的資訊會比較完整，就不會這麼片段、零碎。再來就是他受訪的成本會降低，以後他就會覺得接我的電話是負擔比較輕的。

後者彰顯於「保密消息來源是記者應有的職業道德」（方怡文、周

慶祥，1999，頁 409）這樣的原則上，如同 Shapiro et al.（2013）所主張的，查證也是記者正當化自己職業角色的策略儀式。而且，就新聞實務言之，江靜之（2016 年 6 月，頁 9）的研究指出：「記者若無法保護消息來源，等於自斷新聞線脈，未來新聞查證將十分困難」。她透過記者深度訪談發現，為了在新聞報導中保護消息來源，記者會使用以下策略，包含避免在新聞中掛名、將消息來源張冠李戴，甚至載明消息來源無法證實（但事實並非如此）等。

簡言之，記者當下採取的查證行動可能以「未來」為導向，藉此降低未來的查證成本與可能導致的風險。而且，本研究發現，記者認為無須查證權威消息來源給的正面訊息，或在新聞結束後持續查證以增進自己對消息來源權威性與可信度的認知，這些「（不）查證行動」部分乃為提高未來查證新聞的效率，降低日後的查證成本。亦即，過往相關研究指出，影響記者是否查證的因素或理由，是在前述實務情境下的考量，同時會因記者的查證行動而變。以下繼續分析。

## 二、日常新聞查證與否之考量

根據之前文獻檢閱，記者決定查證與否的主要考量可分新聞呈現、內容訊息及消息來源三大部分。不過，透過深度訪談，本研究有兩大發現，一是「訊息與記者已知的相符程度」是另一關鍵要素；二是記者決定日常新聞「查證或不查」，乃是在前述查證成本、新聞效益及查證不足的風險下，對「新聞呈現的限制與資源」、「訊息內容的主／客觀偏向」、「消息來源的權威高低」及「所得訊息與自己已知的相符程度」的評估。而且，對記者來說，這些要素的評估常需要綜合考量，而非單一論之。以下進行詳細分析。

### （一）日常新聞文類的限制與資源

對記者來說，新聞呈現既為查證設下限制，也提供資源。一方面，記者查證是為報導而做，故須滿足日常新聞的文類需求。例如之前文獻指出記者認知到日常新聞的平衡報導要求（Diekerhof & Bakker, 2012）；記者「個人感覺與直覺」鮮少被當成新聞證據（Clarke, 2003），以及一般認為書面文件的證據力大於言談證據（Elliott, 1994, as cited in Goldstein, 2007, p. 15; Shapiro et al., 2013; Shapiro, Brin, Spoel, & Marshall, 2016, pp. 43-44）。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發現，記者更偏好書面文件證據也與報導需要更多細節及確定程度等，與新聞呈現的需求有關，如財經記者 C3 直言：

我不是因為相不相信這件事情（指消息來源轉述之內容），我可能是因為看完白紙黑字，相較於轉述這件事情，更能確定發生什麼事情，不要連細節都寫錯。

此外，日常新聞傾向將消息來源可信度視為當然（Hunter, Hanson, Sabbagh, Sengers, Sullivan & Thordsen, 2009），故記者報導日常新聞時，偏好權威消息來源。尤其只要消息來源願意具名，記者便可使用具名引述，將證明「內容為真」的責任轉移至消息來源身上（Diekerhof & Bakker, 2012），減輕自己的查證之責。如 C2 所說：

為什麼會再多方查證是因為沒有人願意掛名。沒有人願意掛名，你要求證的就要更多。因為如果你（指消息來源）願意掛名，起碼（若）有問題，是你（指消息來源）公開講的。

換言之，日常新聞在設下文類限制的同時，也提供記者論述資源（如引述），使其能省略查證行動。況且，即使有日常新聞文類的限

制，記者也非僅有一種呈現方式或單一寫法，可惜過去研究並未凸顯此點。事實上，本研究發現，多數時候，記者可視情境及查證進度，自行決定新聞重點（亦即自行決定什麼是該則新聞的「必要成分」，之後會再分析說明）及書寫方式。例如 U2 表示自己無須查證政治人物公開的政策辯護「說了什麼」，但若決定要報導其辯護的根據，便需要向相關專業人士查證；C6 因掌握錄音資料，可精確報導談話過程，故決定以問答方式（Q&A）呈現新聞。又如處理爭議事件，日報每天刊出的日常新聞強調「平衡報導」，但即時新聞因可隨時更新，使得記者無須定要在同一則新聞中做到「平衡報導」（U4、U6）。

尤其記者會發展不同書寫策略，避免查證不足的風險。在本研究中，最常被提及的策略包含：第一，避免報導無法或尚未查證的訊息，如同 A4 所說：「不寫就沒有查證的問題」。第二，縮小篇幅，提供有限資訊，如 A3 所說：「簡單處理，可大可小，三百字市場傳言怎麼樣就出手」。第三，註明記者已進行查證行動，如 C3 所說，在報導中表明：「目前記者已經致電某公司發言人，但目前尚未取得回應」。第四，將可能引發爭議的部分作模糊處理，例如 L5 提及，若無法查證爆料內容，則「會保護到被他（指爆料者）指控的那一方。我們會把他的說法跟現象寫出來，但我們不會去提到對方（指被指控者）」。

## （二）訊息內容的主、客觀偏向

根據文獻及本研究訪談，記者普遍認為依賴消息來源訴說的個人史、主觀經驗、意見、分析及評論等，因為難以或無法查證而將之歸於「無須查證」的範疇。然而，本研究分析發現，記者認為前述內容「無須查證」的實務考量並不完全相同。

對記者來說，消息來源的個人史及經驗，鮮少是日常新聞的重點

（故新聞效益低），加上獲取此類訊息的管道非常有限（故查證成本高），所以只要能具名報導，記者通常不會進行查證。至於意見、分析及評論等，受訪記者普遍接受其屬於消息來源的個人「主觀詮釋」，認為其無從查證，故多強調「平衡報導」的重要。而且，如前所述，由於日常新聞（文類）偏好權威消息來源之專業意見或分析，加上記者清楚經常往來的權威消息來源之立場及聯絡方式，即使需要「確認」，記者也毫不費工夫，故常視之為「蒐集資料」的一環。

值得注意的是，有受訪記者（如 C2、C4、U3）主動提及，個人觀點通常無須查證，除非其中包含可查證的「事實」資訊。而相對於前述偏向個人主觀敘述的內容，從記者角度來看，「客觀」事實除了黃郁琄（2000，頁 77）所指如文件、備忘錄等「非藝術證據」外，還包括組織機構運作模式（如權責歸屬、公文流程等）、現場事件及各種媒介紀錄（如文字會議紀錄、談話錄音錄影、官方網頁、社群媒體或媒體報導等）。

這些「客觀」事實，包含人名、營收數字、法律條文等，因具物質性（materiality），可供複查，加上「人、事、時、地、物」為新聞基本要素，常是新聞重點，故所有受訪記者皆強調應確保此類資訊的「正確性」，如同 C7 所說：「數字、人名、時間、地點、法條，這個時候你一定要 double check」。對記者來說，此類訊息無模糊空間，就像 C4 以業者決定結束營業日期為例指出：「這個東西一翻兩瞪眼……一定要去查證，不然寫錯很糗，立刻打臉自己，打臉報社」。

然而，雖然受訪記者皆強調確認客觀事實之重要，他／她們卻不一定會採取查證行動，尤其面臨以下情況：

第一，如同一般人多相信眼見為真，記者也傾向認為自己親眼目睹最為可信（Reich, 2011a），特別記者親臨現場的主要目的常是「獲取證

據」(Reich & Godler, 2017)。在本研究中，受訪記者多認為無須查證自己親眼目睹的新聞事件，如司法記者 L4 表示自己聽庭時「已經看到一個客觀的事實」，只要忠實敘述即可。尤其現場事件發生之客觀事實可透過媒介紀錄，成為可供複查的「事證」，故多位受訪記者（如 C2、C5、U2、U6）主動提及，若有現場錄音或錄影，便無須再查證現場發生之事。

深入分析，本研究發現，記者偏向相信自己親眼所見，乃因記者認為自己便是「可信的」消息來源。反之，對於不具名消息來源提供的媒介紀錄，受訪記者考慮其可能意圖與新聞影響性等，常強調需要對這些被視為客觀事實的物證進行查證，因為它們可能被「去情境化」，誤導記者。如 L1 述及：

通常不具名的（黑函）殺傷力最強。人事時地物、照片、錄音帶、光碟，什麼都給你……但是你必須認知到，那些證據到底是片段？還是看圖說故事？（消息）源頭無從查證起，你就必須從它裡面寫到的那些人、事、機關去查證。

第二，受訪記者多認為「公開」的客觀資訊，若有具名的消息來源，便無須查證，無論其形式是記者會談話或受訪、公關稿、書類報告、個人臉書或 IG 訊息，甚至新聞報導等。這些訊息具物質性且「公開」，讓記者可引述來源，將之塑造成可被查證的事實，讓新聞更具可信度 (Broersma, 2010)。以記者會為例，C1 認為無須查證，乃因消息來源：「已經公開講了，大家也都會看到他講的，有影像，有什麼證據都很明確」。

這些易得性高的公開訊息雖無法創造高新聞效益，但記者可透過指出消息來源身分，省略內容查證，亦即付出最少的（消息來源）查證成

本，又可轉移並降低（內容）查證不足的風險。因此，個人臉書常被視為可直接引用的個人公開發言（A2、L3、U5、U6）。不過，也有受訪記者如 U7 表示，若新聞是要刊登於紙本報紙（新聞呈現），且自己擁有消息來源的聯絡方式（聯絡成本較低），則「應該要再去問那個人真實的說法，因為有時候有些人的臉書其實不是他們自己寫的」。

第三，對記者來說，考量新聞呈現的需要，容易成為標題或影響新聞版面大小的客觀訊息必須確認無誤。相較之下，對於新聞的背景資料便無須大費周章，能滿足前述條件的客觀資料便已足夠，無須額外確認。例如 L2 被問及若不確定新聞人物的年齡、經歷等資料，他表示：「因為這個是背景資料……上 google（查詢）就可以了」。U7 也提及自己擔任地方記者時，會與同業合作查證非新聞重點的「外圍」資訊，例如一般民眾的觀點或說法等，但對於「官方」這主要消息來源則定要自己親訪。

此外，過去新聞報導被認為無須查證，部分原因也是其常被當成背景資料使用，例如 C1 表示自己通常不會對此進行查證，因為：「我們處理的重點是他（指新聞當事人）的回應，而不是（過去新聞報導之）事件」。也因此，即使不同報紙報導有所出入，因「背景資料也不是重點」，所以 U6 會選擇只寫相同處，或以自己報社的報導內容為準。

最後值得說明的是，許多新聞事件會隨時間而變，使得記者無法保證此刻的「正確」資訊，日後必然「無誤」。特別是 Tuchman（1973）所說的「發展中新聞」（developing news），因事實資訊是在事件發展中逐漸浮現，即使記者能夠掌握前述客觀資訊，也無法保證正確無誤，僅能如 L5 所言：「在出刊的那個時間點，（確認）就是這樣的事實沒錯」。

以嫌犯說詞為例，司法記者 U7 表示，其可能改變，所以即使警政

線記者已從警政消息來源獲得訊息，自己也會再次確認之：「不是說前面（指警政新聞）寫完我們後面就不用再去問」。財經記者 C3 也以報導企業併購案破局之因作為例子指出：「我覺得在程序上沒有到 final 的問題（指併購案最終未成），其實也是各說各話」。故此，記者報導「發展中新聞」經常面臨何時出手的「報導時間點」問題，因為記者固然可等新聞發展成熟，如前述司法或併購程序完成，再行報導，但他／她也可能錯失良機，失去一個獨家新聞。尤其新聞報導也可能「影響」新聞事件，使其生變。例如司法記者 A5 提及曾在報導中指出某案件的偵結日期，但主事者之後卻決定更改，因為他「不照你報紙（內容）去做」。

### （三）消息來源的權威高低

無論根據文獻或本研究訪談皆可發現，擁有現代社會機構權威的內容（如公文、法院判決書、學術研究報告）或消息來源（如行政首長、法官、專家學者），多被認為無須查證。尤其前者，如司法判決，便如 A5 所言，記者「依據是司法機關的認定」，其來源具機構權威性。而「人」作為消息來源，其權威高低又受其組織位置所影響。一方面，從社會學角度來看，組織高層通常會傳達、接收更多資訊，是較有效的溝通者，且擁有較多影響力，所以被記者視為權威消息來源（Roshco, 1975／姜雪影譯，1994，頁 98）。另一方面，消息來源的組織角色如發言人，以及與新聞事件的接近性（黃郁琄，2000；Goldstein, 2007, p. 16），也會提高消息來源權威性。

而且，如本研究之前分析所述，記者查證會偏向耗費最少時間與心力的權威消息來源，故資訊近用的難易程度會影響記者決定是否查證。在現代媒體社會中，大部分機構組織會設立發言人或公關，專事媒體溝

通。公關或發言人成為記者重要的權威消息來源（Reich, 2010），不但因為其有機構權威性，也因其提供記者快速聯絡的管道，大幅降低記者的時間成本。因此，即使記者認為公關或發言人的可信度較低（Barnoy & Reich, 2020; Reich, 2011b），在本研究中，還是有許多受訪記者表示其經常向公關或發言人查證。

更重要的是，本研究發現，權威消息來源提供之內容常被歸為「無須查證」，除了機構權威性以外，更混合以下實務操作考量：

第一，許多時候，某些權威消息來源是記者能獲取相關訊息的「唯一」管道，亦即是否擁有其他查證管道影響記者決定是否查證。例如財經記者 C5 表示，他從某公司身兼發言人的財務長處得知歐元貶值對該公司的影響，此事無須查證，乃因他「無從查證」；L2 提及，即使知道發言人在對自己公司不利的的事情上會「避重就輕」，但他卻可能是該公司唯一能夠或願意發言者。司法記者 L5 以曾報導的某個社會案件為例指出，警方是其唯一消息來源，所以他「沒有辦法查證，因為……（警方是）你可以查證到對象的最根源」。進而，在此種狀況下，有受訪記者如 U2 表示，記者難以要求消息來源舉證，因為擔心消息來源認為自己不被信任，破壞雙方的互信關係。本研究認為，如此也可能增加記者日後的查證成本。

第二，在新聞競爭及供稿壓力下，為求快速刊出，包含公關及發言人等在內的權威消息來源提供的日常新聞通稿，因其成為獨家新聞的新聞效益低且可具名，故常被記者歸為無須查證的範圍。尤其處理即時新聞，U5 強調：「官方給的要比快」；L5 表示在半小時須發兩條即時新聞的情況下，「官方單位給我們什麼，我們就是什麼」。加上即時新聞有篇幅彈性大及持續更新的特質，使得記者無須查證完整再行報導。

第三，如前分析所述，對於權威消息來源樂於提供訊息的正面新

聞，因記者無查證不足的被告風險，故大多視之為無須查證。尤其即時新聞無版面限制，加上組織守門不似紙本嚴格，有些受訪記者會透過即時新聞，提供權威消息來源在新聞中曝光的機會。對記者來說，這些無涉他人利害關係、較無爭議，影響不大且新聞效益低的即時新聞，是其培養與權威消息來源友好關係，降低未來查證成本的資源之一。如 C1 表示：

大家交情好，甚至我欠過他人情，甚至我希望培養他成為我們的線民或是線索來源。他需要知名度，我就會幫他發個即時……（這種新聞）不太會去要求他拿出什麼證據來。

第四，權威消息來源如發言人代表公司或組織發言，其所言會對自身造成影響，如 *Diekerhof & Bakker* (2012) 所說，其有據實以告的壓力，故記者偏向相信其會善盡資訊把關之責 (U2)，「準備好了才會提供」給記者 (L2)。例如司法記者 L4 表示法院或地檢署發布的新聞稿無須查證，因為：「他們發的新聞稿他們自己就會審核它的真實性」。特別是公開、可被具名引述的消息來源，受訪記者皆強調消息來源要對自己所言負責。因此，在新聞實務上，記者傾向認為「具名的東西不太需要查證」(C1)，因為如同 U3 所說，記者認為消息來源「敢具名(就)代表他願意為這件事情負責」。在本研究中，所有受訪財經記者皆表示政府及業者的公開資料無須查證。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具名之消息來源可降低記者的查證需求，減輕記者查證之責，但若新聞影響性太大，風險太高，例如消息來源指控某人有弊案，即使其願意具名，若無確切證據，記者也「不敢處理」(C1)，或如同 U1 所言，必需「自己去查證」。

最後，與之前文獻相似，本研究的受訪記者也傾向將過去的媒體報

導視為無須查證的消息來源。特別當時引發爭議的報導，之後若「無人否認」，C2 強調，則表示那些報導無誤。U3 也坦言：「好像別人報導過的事情就是已經求證過的事，所以我們就不需要求證。不管（我）在哪個媒體都有類似這種感覺」。相對之下，對於其他媒體同線記者的「當下」獨家報導，記者若決定跟進，則該新聞應是有高新聞效益的「大新聞」。對此，依照本研究前述分析，記者理應付出較多查證成本，所以 A2 及 U3 表示，自己會視該報導記者的聲譽或可信度決定是否跟進報導，避免「浪費時間查證」。而且，記者是在同業的報導基礎上增添新資訊，等於同時確認該報導之真偽：

通常更新的時候就已經查證前面（指同業報導）基底了……其實你目的是更新，但是你可以順便查證，因為如果你沒辦法更新，代表前面是假的。（C4）

不過，也有受訪記者表示，若是同業的獨家新聞，在即時新聞的時間壓力，以及不一定能快速接觸權威消息來源等多重限制下，記者多以同業的報導為基底，要求相關消息來源回應，如 U3 所說：「用回應的方式去補查證」。若無法及時取得相關回應，便具名引述媒體報導，本研究認為這也讓記者得以轉移查證責任。

#### （四）與記者已知的相符程度

本研究發現，記者決定查證與否的另一關鍵在於，其所得訊息與其已知的相符程度：兩者相符程度越高，受訪記者認為查證的必要性越低，亦即越不需要付出查證成本。例如 L2 直言：「如果（訊息內容）跟我自己本身認知有出入的話，我才會查證」。

記者的「已知」包含常理、常識、用以區辨資訊內容的路線「領域

知識」及特定時空環境相關之「情境知識」（陳百齡，2004，頁 45），例如消息來源的組織常規及關係脈絡等。分而論之，首先，對記者來說，常識、常理與常情就是一種「理證」（陳百齡、王凌霄，2011，頁 25），包含記者的「過去經驗」也被視為可接受的證據（Diekerhof & Bakker, 2012; Shapiro et al., 2013, p. 668）。舉例來說，A1 表示自己會判斷消息來源之預測「是不是符合常理」；L1 提及某新聞人物的家人是大家「公認」的俊男美女，便無須查證。

其次，記者長期在特定領域經營，擁有路線的領域及情境知識，進而對相關情勢發展的觀察，也被視為一種證據類型，例如 Clarke（2003）研究記者用以判斷 1989 年越南是否將從柬埔寨撤兵之證據類型，發現最多記者使用如國際施壓的「整體政治與經濟情勢」。在本研究中，記者多視這樣的整體情勢為相對「客觀」的事實，例如 C3 表示，若爆料者可信度高，抑或爆料內容與自己對該公司的了解趨近，查證必要性便會降低：

如果你（指爆料者）的可信度非常之高，或者是你（指記者自己）本來就很清楚那個公司內部狀況的時候，你（指記者自己）覺得十之八九（沒有錯誤）……查證這件事情沒有什麼，就無關痛癢。

因此，即使消息來源的主觀意見或分析如前所述，多被認為無須查證，但本研究發現，記者並非一味接受，而是將之對照自己已知，再決定是否需要確認。如財經記者 C5 舉例表示：

產業狀況目前就是，你從大家的出貨量，可以很明顯地知道就是一定有某部分的需求降下來，所以你一定知道這個市場

就是往下了。那不可能有人跟你說，就是大家都在往下，我還一直在往上。這不太對。

或是，即使消息來源願意具名，U6 指出，雖然因此「查證的力道就會比較低」，但若其說法與自己的「一般認知不太一樣」，她也會進行確認。而且，受訪記者多強調自己對線上情勢的了解並非空穴來風，而是之前已獲得相關訊息。例如 A1 提及某新聞即使僅有單一消息來源，他也會報導，因為該消息來源提供的訊息與記者之前聽聞相符：「這個事情傳聞很久了」。

換言之，記者已知的「舊」訊息提高了「新」訊息在記者心中的可信度，因為對記者來說，他／她等於已經交叉確認來自不同消息來源的訊息，如 U2 舉例道：「這件事我聽到的時候，因為前面有 A、B、C（指消息來源），它合邏輯……譬如 A、B、C 受訪者都跟我講一樣的事情……就是說我先前已經查證」。

最後，以上分析凸顯，記者的已知是在每則報導及查證行動中不斷累積，也回應本研究之前分析強調，查證行動具有「未來導向」，不但可提高之後的查證效率、節省查證成本，也同時避免查證不足的風險。如同資深財經記者 A3 報導某公司合併案，直言自己無須查證，乃因該合併案：「都有新聞的脈絡，為什麼線要經營久就在這裡」。對記者來說，「查證」常與「資料蒐集」交織，是有多重目的之連串過程。尤其當查證成本低到無須考量，對記者來說，他／她其實是在蒐集資料過程中「順便」查證，如 A1 所說：

因為我本來就不會只問一個人。我如果問了這個人，他給我這個推理，我打給下一個人，就會順便追加問這個問題。這就是一個順便的事情，不是一個額外的事情。

## 伍、結論與討論

雖然過去文獻指出，記者報導日常新聞多依賴權威消息來源，較少採取查證行動，但事實上，在複雜多變的情境中，記者絕非僅依賴個別單獨因素，決定是否採取查證行動。因此，本研究透過臺灣四大報政治、司法及財經記者的深度訪談，探究記者製作日常新聞時，決定查證與否的綜合情境考量，同時指出查證行動具有未來導向，可進而影響情境。

### 一、主要研究結果

不同於過去研究多聚焦於記者決定查證與否的單一考量、忽略多元情境之間的關係，或未能凸顯記者查證行動的「未來導向」，本研究指出，記者是在查證成本、新聞效益及風險評估的綜合考量下，決定日常新聞「查證或不查」。本研究發現，受訪記者在查證成本（包含所需時間、處理訊息所需之認知負擔，以及接觸消息來源可能產生的心理壓力等）、新聞效益（包含重大或具影響性的新聞）及查證不足的風險（包含對國家社會產生負面影響、導致報社及記者個人聲譽受損及引發法律訴訟等）之間權衡輕重。新聞效益越強，查證不足的風險越大，記者採取查證行動的可能性越高；抑或，查證成本越低，甚至低到無須考慮，「查證」便成為記者蒐集資料過程中的一環。

同時，本研究發現，有時記者即使已經完成報導，他／她還是會持續查證。究其原因，本研究強調，乃是記者的查證行動具有「未來導向」，除了挖掘發展新聞的機會，記者也藉此累積自己的領域及情境知

識，特別是對消息來源權威性與可信度的感知，以提升日後的查證效率，並降低未來的查證成本。

進而，過去文獻指出影響記者決定是否查證的三個關鍵要素：「新聞呈現」、「訊息內容」及「消息來源」，本研究主張，它們並非各自獨立的情境條件，而是記者在前述查證成本、新聞效益及風險評估下，考慮日常新聞「查證或不查」，相互關連與交織的因素。首先，本研究指出，新聞文類是記者查證的限制與資源，且記者查證既為當下，也為未來報導。一方面，記者查證是為報導而做，故會考慮新聞報導的文類需求，例如日常新聞偏好權威消息來源、著重「人、事、時、地、物」等客觀資訊及強調平衡報導等。另一方面，記者可視查證狀況決定新聞重點與呈現方式，甚至運用各種書寫策略彌補查證不足可能帶來的風險，例如模糊或捨棄無法確認的訊息。而且，新聞文類並非一成不變，故記者查證需求也會隨之改變。以作為日常新聞一部分的即時新聞為例，其對速度的要求壓縮記者的查證時間，讓記者偏向依賴無須查證的客觀訊息、查證成本低的權威消息來源，抑或公開、可具名的消息來源，轉移查證之責。

其次，與過去研究相似，本研究也發現，訊息內容越偏向個人主觀詮釋，記者認為查證的必要性越低。但對一般被認為的「客觀」訊息，本研究強調，主要因為訊息內容具物質性，可供複查，故記者偏向認為此類訊息需要查證確認。此外，本研究提醒，有時「客觀事實」是隨新聞事件發展浮現，未到事件發展完成，記者無法確認。更重要的是，不同於過去研究，本研究分析指出，記者考慮內容主、客觀特性與查證的必要性時，還包含其他情境考量：(1) 依賴消息來源個人訴說的個人歷史與經驗，通常不是新聞重點（新聞效益低），加上查證困難（查證成本高），故常被認為無須查證；(2) 記者傾向認為個人意見及分析等為

個人詮釋，無客觀事實可供核實，故未將之視為需要查證之訊息，反而較常強調平衡報導；(3) 記者偏向相信自己親眼所見，因自己作為消息來源，可信度高，無須查證；(4) 公開、有消息來源可具名引述的客觀資料，包含個人臉書、過去新聞報導等，可轉移記者的查證責任，降低查證不足的風險，也使得新聞查證的需求下降；(5) 非新聞重點（如前分析所述，記者多可視查證情況決定新聞重點）的客觀資料因新聞效益低，故只要符合公開、有具名消息來源等條件，便已足夠，無須再行確認。

其三，根據文獻，記者製作日常新聞，偏向認為消息來源權威性越高，查證的必要性越低。不過，本研究發現，記者認為權威消息來源無須查證的原因，除了其具有機構權威性外，還有四個實務考量會弱化記者查證的可能性：(1) 該權威消息來源是記者在時間限制下唯一可查證的對象，查證其他來源或訊息的成本過高；(2) 權威消息來源提供日常新聞通稿可具名（故訴訟風險低），且成為獨家新聞的效益低；(3) 對權威消息來源有正面效益的新聞，無訴訟風險，且能培養與消息來源的關係，降低未來查證成本；(4) 權威消息來源提供之訊息可能影響自身，若再加上可具名引述（新聞呈現），記者便可將辨明訊息內容真偽的責任轉付給消息來源，降低記者查證不足的風險。而引用的新聞報導之所以無須查證，本研究發現，除了如過去研究所言，因為「新聞」被記者視為可信的消息來源（Ericson, 1998）外，也因刊出之新聞有明確出處，具有物質性，可被複查。同時，本研究也指出，對於新聞同業進行的即時獨家報導，受訪記者傾向評估報導者在業界的聲譽及可信度，再根據自己的查證成本限制，決定是否及如何跟進報導。

最後，本研究發現，記者會依所得訊息與自己已知的相符程度，決定是否需要查證：兩者相符程度越高，記者採取查證行動的可能性越

低。進而，由於記者是在蒐集資料與查證行動中累積已知，故若查證成本低，即使記者已掌握客觀證據，其依然傾向再進行採訪。而這也可解釋本研究強調的，記者查證行動的「未來導向」，亦即記者此刻蒐集、查證資料的行動具有未來導向，可提升查證效率並節省查證成本。

##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探析記者在實務情境下，決定日常新聞查證與否之多重考量，但限於研究重點、使用之研究方法及篇幅等，本研究有以下三點研究限制，並據此提出未來研究建議如下：

第一，本研究聚焦於一般日常新聞查證，並未討論政治、司法、財經等新聞類型及路線特性如何影響記者的查證決定。舉例來說，受訪政治記者提及，查證時會特別注意權威消息來源的政治立場及利害關係、司法記者查證須顧及「偵查不公開」原則，以及財經記者特別著重數字等。不同路線記者如何因應這些新聞呈現需求進行查證，以及透過哪些論述技巧呈現自己掌握之證據，是未來可探究的議題。

第二，本研究雖透過深度訪談指出，新聞呈現既是記者決定查證與否的限制也是資源，並整理記者經常用來彌補查證不足之書寫策略，但並未觸及記者實際使用之論述策略。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用文本分析，深入探究記者如何根據證據呈現新聞重點，於保護消息來源的同時取信讀者，以及運用各種文類及論述資源建立新聞證據。

第三，本研究雖指出記者決定日常新聞查證與否之相關考量，但未深入分析記者的決策過程與品質。舉例來說，相較於年資較淺的記者，資深記者似乎因為掌握較多路線領域及情境知識，同時已有熟識且信任的權威消息來源，使其更常參照自己所知。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使用

個案研究法，詳細分析不同記者決定查證之過程及行動，豐富吾人對新聞查證實務之理解。

## 參考書目

- 方怡文、周慶祥（1999）。《新聞採訪理論與實務》。臺北市：正中。
- 王淑美（2018）。〈網路速度與新聞——轉變中的記者時間實踐及價值反思〉，《中華傳播學刊》，33: 65-98。
- 江靜之（2016年6月）。〈記者求真路：論新聞查證〉，「2016中華傳播學會『騷動20創新啟航』研討會」，嘉義縣民雄。
- 江靜之（2022）。〈從新聞組織看日常新聞查證：以臺灣四大報為例〉，《傳播研究與實踐》，12(1): 113-152。
- 李利國、黃淑敏譯（1995）。《當代新聞採訪與寫作》。臺北市：周知文。（原書 Brooks, B. S., Kennedy, G., Moen, D. R., & Ranly, D. [1992]. *News reporting and writing*.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ress.）
- 李嘉紘（2013）。《原生網路新聞網站新聞產製研究：從新聞價值與消息來源面向探討》。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碩士論文。
- 姜雪影譯（1994）。《製作新聞》。臺北市：遠流。（原書 Roshco, B. [1975]. *Newsmaking*.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陳百齡（2004）。〈新聞工作如何蒐集資料？專家知識的初探〉，《圖書與資訊學刊》，51: 35-48。
- 陳百齡、王凌霄（2011）。〈判讀影音檔案：援引考據辨偽方法於新聞畫面查證工作〉，《臺大新聞論壇》，10: 3-53。
- 曾美珠、李燕蕙（2006）。〈非安寧病房護理人員面對遺體護理之心理歷程探討〉，《中華心理衛生學刊》，4: 395-415。
- 黃郁琄（2000）。《記者查證之判斷歷程研究》。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慧雯（2013）。《科技生活現身：「網友」在新聞產製中的角色分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 100-2410-H-004-217）。臺北市：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 蕭伊貽、陳百齡（2013年7月）。〈Youtube 全民新聞臺——爭議性影音素材之使用與查證〉，「2013中華傳播學會年會」，新北市新莊。
- Barnoy, A., & Reich, Z. (2019). The when, why, how and so-what of verifications.

- Journalism Studies*, 20(16), 2312-2330.
- Barnoy, A. & Reich, Z. (2020). Trusting others: A Pareto distribution of source and message credibility among news reporter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9(2), 196-220. doi: 10.1177/0093650220911814
- Becker, H. S. (1967). Whose side are we on? *Social Problems*, 14(3), 239-247.
- Blandford, A., & Attfield, S. (2010). *Interacting with information*. San Rafael, CA: Morgan & Claypool Publishers.
- Brandtzaeg, P. B., Lüders, M., Spangenberg, J., Rath-Wiggins, L., & Følstad, A. (2016). Emerging journalistic verification practices concerning social media. *Journalism Practice*, 10(3), 323-342.
- Broersma, M. (2010). The unbearable limitations of journalism: On press critique and journalism's claim to tru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2(1), 21-33.
- Canter, L. (2014). From traditional gatekeeper to professional verifier: How local newspaper journalists are adapting to change. *Journalism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3(1), 102-119.
- Clarke, J. (2003). How journalists judge the 'reality' of an international 'pseudo-event': A study of correspondents who covered the final withdrawal of Vietnamese troops from Cambodia in 1989. *Journalism*, 4(1), 50-75.
- Coddington, M. (2014). Defending judgment and context in 'original reporting': Journalists' construction of newswork in a networked age. *Journalism*, 15(6), 678-695.
- Diekerhof, E., & Bakker, P. (2012). To check or not to check: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source checking by Dutch journalists. *Journal of Applied Journalism & Media Studies*, 1(2), 241-253.
- Donsbach, W. (2004). Psychology of news decisions: Factors behind journalist's professional behavior. *Journalism*, 5(2), 131-157.
- Ericson, R. V. (1998). How journalists visualize fact.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60, 83-95.
- Ettema, J., & Glasser, T. (2006). On the epistemology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G. S. Adam, & R. P. Clark (Eds.), *Journalism: The democratic craft* (pp. 126-140).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enton, N., & Witschge, T. (2011). 'Comment is free, facts are sacred': Journalistic ethics in a changing mediascape. In G. Meikle, & G. Redden (Eds.), *News online: Transformations and continuities* (pp. 148-163).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Godler, Y., & Reich, Z. (2017). Journalistic evidence: Cross-verification as a constituent of mediated knowledge. *Journalism*, 18(5), 558-574.
- Goldstein, T. (2007). *Journalism and truth: Strange bedfellows*.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Heflin, K. (2010). *In Twitter and Wikipedia we trust?: Online information and the crisis of credibil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Retrieved from

- [https://getd.libs.uga.edu/pdfs/heflin\\_kristen\\_m\\_201012\\_phd.pdf](https://getd.libs.uga.edu/pdfs/heflin_kristen_m_201012_phd.pdf)
- Heravi, B. R., & Harrower, N. (2016). Twitter journalism in Ireland: Sourcing and trust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9*(9), 1194-1213.
- Hermida, A. (2012). Tweets and truth: Journalism as a discipline of collaborative verification. *Journalism Practice, 6*(5-6), 659-668.
- Hermida, A. (2015). Filtering fact from fiction: A verification framework for social media. In L. Zion, & D. Craig (Eds.), *Ethics for digital journalists: Emerging best practices* (pp. 59-73). New York, NY: Routledge.
- Hunter, M. L., Hanson, N., Sabbagh, R., Sengers, L., Sullivan, D., & Thordsen, P. (2009). *Story-based inquiry: A manual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Retrieved from [http://portal.unesco.org/ci/en/ev.php-URL\\_ID=29032&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http://portal.unesco.org/ci/en/ev.php-URL_ID=29032&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html)
- Joseph, B. (2019). Which bedrock in a sea of change? *Journalism, 20*(5), 679-687.
- Kovach, B., & Rosenstiel, T. (2001). *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 What news people should know and the public should expect*. New York, NY: Three Rivers Press.
- Kovach, B., & Rosenstiel, T. (2010). *Blur: How to know what's true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overload*. New York, NY: Bloomsbury.
- Lecheler, S., & Kruikemeier, S. (2015). Re-evaluating journalistic routines in a digital age: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use of online sources. *New Media & Society, 18*(1), 156-171.
- Machill, M., & Beiler, M. (2009).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rnet for journalistic research: A multi-method study of the research performed by journalists working for daily newspapers, radio, television and online. *Journalism Studies, 10*(2), 178-203.
- Martin, N. (2017). Journalism, the pressures of verification and notions of post-truth in civil society. *Cosmopolitan Civil Societ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9*(2), 41-55.
- Rauchfleisch, A., Artho, X., Metag, J., Post, S., & Schäfer, M. S. (2017). How journalists verify user-generated content during terrorist crises. Analyzing twitter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 Brussels attacks. *Social Media + Society, 1*-13. Retrieved from <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pdf/10.1177/2056305117717888>
- Reich, Z. (2010).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PR on published news in increasingly fragmented news environments. *Journalism Studies, 11*(6), 799-816.
- Reich, Z. (2011a). Source credibility and journalism: Between visceral and discretionary judgment. *Journalism Practice, 5*(1), 51-67.
- Reich, Z. (2011b). Source credibility as a journalistic work tool. In B. Franklin, & M. Carlson (Eds.), *Journalism, sources and credibility: New perspectives* (pp. 19-36). New York, NY: Routledge.
- Reich, Z., & Godler, Y. (2017). Being there? The role of journalistic legwork across new and traditional media.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94*(4), 1115-1129.
- Shapiro, I., Brin, C., Bédard-Brülé, I., & Mychajlowycz, K. (2013). Verification as a

- strategic ritual: How journalists retrospectively describe processes for ensuring accuracy. *Journalism Practice*, 7(6), 657-673.
- Shapiro, I., Brin, C., Spoel, P., & Marshall, L. (2016). Images of essence: Journalists' discourse on the professional "discipline of verific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1, 37-48.
- Shoemaker, P. J., & Reese, S. D. (1996). *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s on mass media content*. New York, NY: Longman
- Thurman, N. (2015). Real-time online reporting: Best practices for Live Blogging. In L. Zion, & D. Craig (Eds.), *Ethics for digital journalists: Emerging best practices* (pp. 103-114). New York, NY: Routledge.
- Thurman, N., & Walters, A. (2013). Live blogging—digital journalism's pivotal platform? A case study of the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form of live blogs at Guardian.co.uk. *Digital Journalism*, 1(1), 82-101.
- Tuchman, G. (1973). Making news by doing work: Routinizing the unexpect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1), 110-131.
-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Taylor, J. (2015). An examination of how student journalists seek information and evaluate online sources during the news gathering process. *New Media & Society*, 17(8), 1277-1298.
- Winterlin, F. (2017). Trust in distant sources: An analytical model capturing antecedents of risk and trustworthiness as perceived by journalists. *Journalism*, 1-16. Retrieved from <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pdf/10.1177/1464884917716000>
- Winterlin, F., & Blöbaum, B. (2016). Examining journalist's trust in sources: An analytical model capturing a key problem in journalism. In B. Blöbaum (Ed.), *Trust and communication in a digitized world: Models and concepts of trust research* (pp. 75-90). Cham, CH: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Zhang, X., & Li, W. (2020). From social media with news: Journalists' social media use for sourcing and verification. *Journalism Practice*, 14(10), 1193-1210.

# To Verify or Not To Verify, That is the Question: Newspaper Journalists' Considerations of Daily News Verification

Chin-Chih, Chiang\*

## ABSTRACT

Verification is a core value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and especially in the digital age it adds significance to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Canter (2014) found that local British journalists regarded themselves as “verifiers of news”, yet according to previous publications, journalists in daily news production neither spend much time nor put lots of effort into verifying like the public expects.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at - namely, journalists do not have enough financial and time resources, they are familiar with and trust their sources, and what journalists need is relatively accurate information and not an absolute truth. Despite that, journalists do not ignore the importance of news verification, as they still verify while producing daily news.

Journalists in theory should verify the source of the content and the content itself independently (Brandtzaeg, Lüders, Spangenberg, Rath-Wiggins & Følstad, 2016, p. 325), but in daily news production, source verification is the key (Barnoy & Reich, 2020; Rauchfleisch, Artho, Metag, Post & Schäfer, 2017). Furthermore, because journalists rely heavily on their regular authoritative sources in daily news production, source credibility becomes a practical mechanism that helps them decide whether or not to verify (Reich, 2011a). However, Reich (2011b) also pointed out that source credibility does

---

\* Chin-Chih Chiang is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morecc@nccu.edu.tw.

not fully explain why journalists decide to cross-check their informati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this topic indicates that when journalists decide whether to verify or not, they tend to consider three major contextual factors: news genre constraints,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and source authority and credibility. However,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a journalist's decision is not only context-dependent, but also highly dynamic. Until now, there has been scant research on how journalists consider the interwoven contexts and how they regard news verification as a future-oriented task. Therefore, by focusing on daily news production,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journalists' practical consideration of multiple contexts when they decide whether to verify or not.

The data of this study comes from a research project that aims to examine, in daily news production, how journalists decide to verify, their consideration and verification practices, and how news organizations establish their verification routines and norms. We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30 editorial supervisors and journalists specializing in politics, judiciary, or finance in Taiwan's four major newspapers. All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between the middle of April 2018 and the beginning of July 2019. Each interview was approximately 2 hours in length, and all were audio-recorded and transcribed verbatim.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in daily news production the journalists' consideration and decision about whether to verify or not, and so we focu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25 interviewed journalists. The interviewees were asked to classify the information which they decide to use in their news articles into three types: the information they have to verify, information that does not need verification, and the information they could decide either way. The researcher then asked them to give examples of each information type to elaborate on their reasons and the various contexts they took into consideration.

There are three main findings in this article as follows. First,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journalists' decision about whether to verify is based on weighing

the expense of verification (time, cognitive processing, and interpersonal pressures), the benefit of the news (importance or impact of the news), and the risk of lacking full verification (it might cause a negative impact on society, their news organization, and the journalists themselves). Therefore, the higher benefit and risk a news article has, the higher the probability is that journalists will start verifying.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he expense of verifying is negligible, journalists are inclined to regard news verification as part of information gathering and proceed with verification while gathering information.

Second, in addition to news genre constraints, source authority, and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ing journalists' decision about verifying or not, this study finds that journalists tend not to verify content if it is similar to previously acquired information. Furthermore,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at the contextual factors are not independent, but interwoven and affected by the expense of verification, the impact of the news, and the risk of lacking full verification as mentioned above. For example, in daily news production, one of the reasons, as stated in previous literature, that journalists skip verifying the information offered by their authoritative sources is the sources' authority and credibility. However, there are four other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as follows: (1) Journalists tend to believe that authoritative sources will avoi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offering incorrect or fake information to journalists. If journalists can use authoritative sources' names in news articles, it will especially transf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verification to the source, and journalists can avoid the risk of being sued and being accused of lacking verification. (2) With limited time, the authoritative source might be the only one that journalists can reach for help to verify. (3) The information that authoritative sources provide to all journalists is not exclusive, and it can always be used with the sources' names, and so the news benefit and risks are low. (4) Journalists do not verify news that is beneficial to authoritative

sources, because both its newsworthiness and its risk are low, and it might contribute to developing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authoritative sources.

Third,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at verification, as an action, is future-oriented. We find that journalists might continue verifying even after some news articles have been published. This is because, in the process of news verification, journalists can continue to develop news stories as well as accumulate their domain and situational knowledge, especially their perception of authoritative sources' authority and credibility. All such factors can help them to reduce the expense of verification in the future.

Our findings contribute to new knowledge on how journalists regard news verification as a future-oriented task and how journalists consider multiple contexts when they decide whether to verify or not. We suggest future research could explore the impact of field characteristics and journalists' experiences on journalists' verification decisions or use discourse analysis to study how journalists specializing in different fields employ discourse techniques to construct evidence.

**Keywords:** context, daily news verification, expense of verification, future-oriented, news genre, source credibility

